

大批中药材霉变令人痛惜

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领导人的渎职行为应当追究

编者按：河北省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大批药材霉烂变质，实在令人痛惜。官僚主义破坏经济建设，压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建设四化道路上的拦路虎。试问，对渎职人员不追究责任，严肃处理，怎能惩前毖后？！

本报讯 据《河北日报》报道：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大批药材因变质失效而报废。今年5月，该公司向省医药公司报损花粉106万多斤、怀牛膝74,000多斤、当归53,8万多斤。今年8月份，该公司又向省医药公司报损花粉110万多斤、白芍12万多斤、怀牛膝20万多斤、葛根76,000多斤、首乌28,000多斤、马齿苋36,000多斤。两次报损使国家遭受损失267万多元。

这一严重的经济损失，主要是由于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及有关部门经营管理制度松懈，盲目收购，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另外，省医药公司脱离市场销售实际，盲目下达中药材收购计划，也是造成大量积压以致霉烂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从1978年起，花粉各地库存积压，调出大幅度下降。省医药公司今年却给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安排花粉收购计划150万斤，该公司当年只调出44.5万斤，其余全部存放在库。1979年省公司又给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安排花粉收购计划80万斤，该公司当年只调出9万斤，使大量花粉堆积在露天货场。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不仅没有及时向上级反映药材的市场销售情况，反

而任意增加收购量。1978年他们比省下达计划多收购花粉35万斤，1979年多收32.95万斤。此外，这个公司还盲目收购了大批没有销路的其它药材，造成更严重的积压和霉变。

收购药材，本应十分讲究质量。但是，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没有验收制度，收购上来的药材质量低劣，不好推销，难以保管。每到收购季节，该公司总是强调人少点多，对下边收购工作检查、指导不力。入库的药材按规定应该定期检查，适时倒垛、熏蒸、晾晒。可惜这里的规定只是一纸空文，十几个药垛从没有进行过认真检查、翻倒。从1977年开始，药材出现比较严重的霉烂、虫蛀现象，公司负责人却强调“没条件”、“费用开支大”、“不合算”，而不积极设法抢救药材，任其霉烂。

公司领导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也拿不出改进措施。他们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而仓库管理却一片混乱。去年，一个保管员勾结社会上的坏人，盗窃了库中价值5万元的牛黄、珍珠等贵重药材。公司负责人不但不对仓库进行认真整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还说什么“准作案准负责，领导没有叫他们去偷”。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在经营管理中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并非一日，作为上级业务领导单位的省医药公司却从没有进行过追究和敦促，反而把这个中药材公司树为全省先进单位。

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大批药材霉烂变质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该公司负责人在5月份给省医药公司写了个所谓的检查报告，主要强调客观原因；而省医药公司对此事又采取了官僚主义态度，批复把大批药材报废，使此事不了了之。保定地区商业局也丝毫没有追查有关人员责任的意思。这件事引起了保定地区中药材公司干部职工的不满，要求有关部门严肃处理这一问题，向有关人员追究经济责任。

的，也要研究过渡的办法，不能以试点办法与现行规章制度有矛盾为借口，拒不执行经国务院批准的试点办法。

新华社记者 戚 伟

各部门都要支持扩大企业自主权

记者来信

目前，广东省有95个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从各试点单位的情况看，前一段凡有各级

经委和财政部门在抓利润留成，其他有关部门则对试点工作支持不够，还没有认真考虑改革本部门的规章制度，以适应企业扩大自主权的新情况。工业企业试点中碰到的许多新问题同这些部门有关，但他们往往互相扯皮，致使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许多规定不能具体落实。

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有出口业务的企业有权获得外汇分成。可是，广东省试点一年多来，至今没有一个企业应得的外汇分成。广州电子工业公司是我国最大的一个手电筒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去年为国家换回外汇1,284万美元，今年上半年又换回590万美元。今年初，这个公司按照外汇分成比例，算出去年应得分5万多美元。但到市二轻局询问到哪里提取这笔外汇分成，答复是：“我们不知道。”最后问市经委，回答是：去年的外汇全部被上级有关部门统一使用了，外汇分成从今年开始。

今年又过去了10个月，外汇到哪里去拿，至今仍无着落。为了加强在国际市场竟争能力，这个公司准备从香港买两支手电筒做样品，但由于没有外汇一直解决不了，后来只好通过本公司一个职工在香港的亲友带回来。难怪公司职工的工资，电商公司虽然是个年创汇千万美元的富翁，但连买进两支手电筒的几块美元都没有，外汇分成权成了一句空话。

试点企业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不能按招招工，择优录取。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后，许多试点单位要求精简人员，而有些地方的劳动部门还要给企业分配大量待业人员。

根据国务院和广东省的有关规定，试点企业超计划生产的产品可以自销，包括远销外省或出口。但有些商业、外贸部门仍按老框框办事，使企业自销产品碰到重重阻力。广东

的水果糖味道好，包装也较好，北京、上海和东北各省纷纷来广东采购，但商业部门卡住不发外运证。江门南方食品厂是试点企业。今年以来，商业部门收购这个厂的各种糖果不到产量的一半，剩下的一半要工厂自找出路，而且不准工厂把水果糖卖给外省，使这个厂的糖果积压300多吨，产量去年的7,000吨下降到今年的4,000吨。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中，如何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呢？试点单位的许多同志认为，省委、省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责无旁贷地要亲自抓经济改革，经委、计委和财政、税务、银行、劳动、物资、物价、外贸、商业、人事等部门，都应大力支持试点工作，把试点企业真正当作是本部门的试点单位，积极主动地改革束缚企业手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现行政策、制度和办法。目前最大改

全国肉类食品加工销售经验交流会在京召开

中国食品总公司和商业部冷藏局，于本月15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肉类食品加工销售经验交流会。

右图：会议期间展出的各地肉制品。

邵宏杰 李小群摄影

佛山地区科委取得新成果

解决天然二氧化碳气脱硫难题

本报讯 记者张跃良报道：广东省佛山地区二氧化碳研究所在兄弟单位协助下，成功地解决了天然二氧化碳气脱硫工艺难题，使我国第一口天然二氧化碳气投入生产，日产液体二氧化碳15吨。这项研究成果有投资少，见效快，技术设备适合我国现有条件等优点。

这口天然二氧化碳气井是广东省地质局于1977年在南海县官窑打出的。该井气体储量丰富，纯度很高。但是，利用天然二氧化碳气制取二氧化碳首先要解决脱硫问题。目前，国外只有几个国家可以把气体中含硫量降到国际市场的销售标准（百万分之零五以下）。为了节省购买脱硫工艺专利的外汇，佛山地区科委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攻克这个技术难关，他们集中了人力、财力，成立了二氧化碳研究所和实验工厂，开始了脱硫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重庆情报所、广东测试所、广东省科学院以及广州造船厂等单位的支援。经过一年多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脱硫工艺技术，使这口气井生产的液体二氧化碳纯度达99.9%，含硫量只有百万分之零三六。目前，这口气井的产品已供应一些工业部门使用，并且同外商签订了供货合同，开始为国家提供外汇收入。

上海第二十二棉纺织厂，用国产配套设备新建的我国第一个气流纺纱实验工厂第一期工程已经完工，有4,000锭气流纺投产。采用气流纺纱新技术，产品质量明显提高，用工约省40%。

新华社记者 张刘仁摄

要把北京建设成为模范城市 切实改善环境卫生

编辑同志：

听到北京市负责同志的讲话，要在几年内把北京建设成为全国第一流的模范城市，我很受鼓舞。最近陪外宾参观香山和颐和园，听到他们的反映，为了改进工作，特把反映写给你们。

香山不大，游客非常拥挤，其中有不少外宾来游览，欣赏著名的“香山红叶”。我陪同的外国朋友和其他外宾，对香山服务设施之差深感不满。有的说：“太可惜了，这么美丽的地方，连休息喝一杯咖啡的地方都没有。”我亲眼看见外宾走进厕所马上逃出来：“实在太脏，到处是

粪便，没有人负责打扫，臭不可闻，天气这么冷，还有很多苍蝇。”有一位外宾说：“我实在受不了厕所的味道，而且一无便纸，二无肥皂、毛巾。”

到了颐和园，长廊里到处是瓜果皮壳，有一个外宾脚踏上一块柿子皮几乎摔一跤。我陪同的外国朋友很诚恳地对我说：“中国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你们的北京车站和首都机场都是第一流的，可是服务工作很差。为什么你们不用收费的办法，凡用厕所的外宾、外籍华人、港澳同胞一律收费，他们将乐于付这笔钱，可是你们要使厕所没有

臭味，要有专人负责，随时打扫冲洗。”

因工作关系我经常陪外宾去北京、上海游览，他们无不赞赏北京名胜古迹之多和伟大，但一谈到服务工作，都说“太可惜了，为什么不向其他国家好的游览地方学习呢！”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我建议北京所有公共场所，包括街道的男女公共厕所都要专人负责，打扫冲洗干净，让群众来评，工作好的受奖，工作差的受罚，这也可以解决部分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当然要做好思想工作。如果清洁卫生工作不好搞，还谈什么几年内把北京建设成为

一个模范城市？这是一个影响国际声誉的问题。我呼吁北京市领导同志亲自抓这件事。

全国人大代表 刘念智

编辑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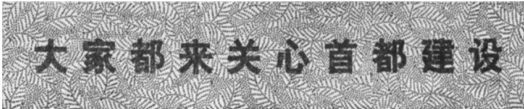
最近的一天，我从广安门中医医院看病出来，已是中午十二点

多了，想就在街上吃顿饭。附近没有找到吃的，就登上某菜市口。当我兴冲冲地走向上海餐厅小吃部时，远远便看见吃饭的长龙已排至大门外。当时饥肠辘辘，长龙一动也不动，原来鲜肉包子已经没有了。据说，要等包好上屉出笼，起码要半个小时。这当儿，店里又供应了馄饨，我实在懒得再排队，就吃碗馄饨且充饥。到馄饨吃完，包子上未上屉，长龙仍在，我暗自庆幸。但馄饨毕竟是馄饨，肚子未饱，于是出门往前走几步，想到餐厅里再找补点，尚未进门，就碰了钉子，守门的嚷嚷：已经到了点了，不卖了。无奈

建议北京市有关领导部门抓紧解决上街吃饭难的问题

两个小时，而且又未吃好。北京做农难、吃饭难等问题何时才能有所改进呢？报载某市的第一书记和群众一起挤公共汽车，感受深切，于是下决心解决交通问题。希望北京市有关的领导们，也能经常到街上了解了解这些情况，亲身感受感受，从而拟定有效的措施，抓紧落实，也许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杨泓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

（上接第一版）你没有空，别人代你写也行。

邓副主席：没有这个时间。而且我这个人是个土包子，没有文化，我不大喜欢讲自己的事情。当然我革命几十年也干了些事，但还谈不上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逐步把工作交给富有能力强的人。

费尔：受教育的程度与一个人的智力和能力没有什么关系。有的人受教育少，但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很差。我总希望你写点回忆录。

邓副主席：现在没有时间。也许到退休以后作点回忆录可能，现在不成。你希望我们政策要有延续性，我想，选好一些青年人接班，这就能使我们的政策有延续的保证。

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这是全球战略所要求的

费尔：里根先生就任美国总统后，你是否期待他到中国来访问，同你和中国总理会晤？

邓副主席：当然欢迎。这取决于里根先生的考虑和他的时间。因为中美关系是和共和党执政时尼克松先生开始恢复接触的，又是共和党总统发展的，后来民主党卡特总统又发展了这些关系。多次听到，发展中美关系是美国两党的政策。希望里根执政后不要使这种关系停滞，更不要倒退，需要继续发展两国的关系，这是全球战略所要求的。这是一个最富有一个最有利的国家打交道。中国虽然是个穷国，但从战略上来讲，还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

主犯吴法宪出庭受审

（上接第一版）实际上是“舰队参谋长”。

为林彪搞反革命政变，为林彪阴谋杀害毛泽东东，提供了方便，提供了条件，培养了人材，培养了骨干。”

随后，法庭用幻灯投影出示了大量证据。其中有林彪出示了“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王飞的照片，就在那次接见过程中，林彪授意周宇驰等推荐林果为“联合舰队”的总司令。

法庭上还宣读了空军司令部原办公室主任刘世英的供词。供词说：“联合舰队”是由吴法宪批准的以林果为组长的调查研究小组扩展而成的。林果在看了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的联合舰队后，曾与周宇驰商量，把调研组扩展成“联合舰队”。林立果是“舰队司令”，周宇驰是“舰队参谋长”。

法宪追林彪、叶群，支持纵容林彪果，给了他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林立果利用他在空军的地位和特权，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组成了“联合舰队”，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这个“联合舰队”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你提出的“两个一切”以及造成的后果，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充分的。本法庭对这个犯罪事实调查结束。随后，他宣布休庭。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曾汉周、黄玉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特别检察厅副厅长陈厚、史进前，出席了今天的庭审。今天出席的律师是马克亮、周厚元。六百多名代表旁听了今天的庭审。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法庭庭长曾汉周、黄玉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特别检察厅副厅长陈厚、史进前，出席了今天的庭审。今天出席的律师是马克亮、周厚元。六百多名代表旁听了今天的庭审。

在记者的案头，有几幅记录着林彪一伙叛国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照片：

一架摔得残骸遍地的三叉戟飞机，尾部留着“256”机号，这是林彪座机的标号。飞机残骸旁，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腿露的尸体：一具脸孔瘦削的男尸，脑袋光秃，左腿摔断，他是林彪。

一具女尸，左臂摔断，她是林彪的老婆叶群。另一具男尸，腰系手枪。据当年我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人员报告，他们曾在这具尸体附近发现印有林果姓名、年龄的工作证。经过鉴定，他就是林彪、叶群的儿子林立果。

林彪一伙谋杀毛泽东主席、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之后，仓惶叛国出逃，折戟沉沙，暴尸于异国荒野，实在是历史的绝妙安排。

（一）

1971年9月林彪一伙发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曾经是一场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及其一伙是怎样策划阴谋，又是怎样以自取灭亡告终的，历史是最公正的见证人。

追溯一些往事，我们就会发现林彪一伙为发动反革命政变，早已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还在1966年8月，林彪、叶群就勾结江青，采用极为卑劣的手段，第一个捏造材料诬陷、迫害当时我党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同志。

——1967年5月13日，林彪、叶群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三军造反派”的“领袖”，吴、李、邱即向林彪献表“忠心”。1968年黄永胜来北京后，加入了这个行列。黄、吴、李、邱成为林彪的“四大金刚”。林彪还勾结陈伯达作为他的“军师”。他指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伙，多方造谣，网罗一批死党，为他篡权服务。

——早在1966年5月，林彪、叶群就大量搜集古今中外叛变者的材料，从中研究搞反革命政变的伎俩。

——1969年10月17日，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令，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宣称：“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在林彪的指使下，陈伯达、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到处吹捧林彪是“非凡的天才”，“是一个可以和斯大林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宣扬什么恩格斯、马克思、林彪的‘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光鲜的助手”。黄、吴、李、邱还在北京、河北、山西、湖北等地建林彪纪念馆，为林彪篡夺最高权力、建立法西斯王朝大造舆论。

林彪及其死党，就是这样在十年动乱的最初几年里，表面上“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而背地里却在千方百计地阴谋夺权。这一切，当时善良的人们是想都不会想到的。

1970年8月下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认为夺权时机已成成熟，就亲自出马，带领他的死党，向全会发动了突然袭击。他们不顾毛主席早就多次提出，并得到党中央同意的关于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本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和要求，利用他们的地位，抛开会议规定的议程，抢先发难。8月23日全会开幕，林彪第一个抢着在会上讲话，别有用心地坚持要设国家主席。8月24日，在林彪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按照统一口径，同时在几个小组会议上发起“攻势”。当时的情况，就象毛主席形容的那样，“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的这场“攻势”，是反革命夺权性质的严重事态，其目的就是要为林彪抢夺国家主席的职位。林彪的这一阴谋，在庐山会议前的1970年7月叶群和吴法宪密谈中就讲得明明白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党中央很快察觉了他们的阴谋。8月25日毛主席为此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陈伯达在会上散布的一些谬论，并找林彪谈话。周恩来同志连续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责令他们向党中央作出检查。会议前一段留守北京的黄永胜刚上山不久，见势不妙，赶忙销毁了他早已按林彪的意旨准备上好庐山“开炮”的讲话稿。

林彪一伙在庐山发动的这场反革命叛乱夺权丑剧，只有两天的寿命，就此告终。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脸色苍白的林彪，在山间别墅里成天套拉着光秃的脑袋，疯狂一时的叶群哭丧着脸，一筹莫展。林立果气急败坏地骂着：“翻车了，倒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指叶群）搞的，她想抢头功，尽是瞎指挥！”

但是，林彪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在山上就对吴法宪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9月7日，林彪带着叶群离开庐山。黄、吴、李、邱一起下山到九江机场为林彪送行，并由叶群导演，把林彪拥坐中间，在飞机上合影，既是由念，又是言志。林彪亲自开着汽车，在去庐山仙人洞的路上对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和七三五〇部队政委陈励耘说：“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二）

1971年2月，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来到苏州的一所别墅，开始秘密策划血腥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林立果1967年到空军时还不是党员，却由吴法宪安排在空中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第二年，吴法宪自己作介绍人把林立果发展入党。第三年，即1969年，25岁的林立果就被吴法宪封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宣布把空军的一切指挥大权都交给林立果。空军广大指战员当时敢怒不敢言，但背地却流传一首打油诗以表心中的愤懑。打油诗说：“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林立果果然住在温都尔汗后，又加了一句“五年见阎王”。林立果青云直上，凭借他的地位与权势，很快

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

便在空中军里纠集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一伙死党组成一支为林彪效劳的别动队，美其名曰“调研小组”。后来他们观看了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林立果欣喜若狂地说：“我们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所谓“联合舰队”就此得名。

1971年3月21日，上海巨鹿路一幢楼房的密室内，烟雾腾腾。林立果奉林彪之命，在这里同“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和李伟信（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密谋制订反革命政变的具体计划。

当时林立果分析形势时说：“现在首长（指林彪）接报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的接报，等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持住；二是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三是提前装报，办法是搞掉日—52（诬蔑毛主席的代称），实行武装起义”。林立果要他们按“提前装报”的办法办，并向他们说：“根据目前的形势，首长只搞个计划”。他还对于新野说：“这件事我和首长已谈过，就由你先写”。

经过一阵密谋，他们又讨论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问题。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两天后，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便制订出来了，它的代号是《“571”工程纪要》。《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认为“B—52……夺对我们不放心”，提出“属子自拉罗网式”——利用上层集团一网打尽；先斩后杀，既成事实，迫日—52就范”；“搞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纪要》阴谋“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纪要》还要求发扬法西斯武士道的“江田岛精神”，象蒋介石的反革命训词那样，“不成功便成仁”。

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原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江腾蛟几年前因为反革命军被解除职务，现在林彪却给了他以特殊的恩宠。在林立果召开这次密会前夕，他已去上海治病为名，戴上大口罩，乘坐吴法宪给他派的一架专机离京，一到上海机场，就被秘密送进了上海新华路的一幢楼房里。

这次会整整开了一夜。林立果在会上说：“现在是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次会议确定了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以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南京以周建平为“头”，江腾蛟被封为第一线指挥，“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指挥班子宣告成立，这伙法西斯分子就走进餐厅，碰杯祝酒。林立果得意忘形地说：“我们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三国四方’会议。”江腾蛟说：“我们都是风羊的，头上长角的……”，话音未落，发出一阵喀斯底里的狂笑。

从此，林彪一伙为准备反革命政变而进行的各种阴谋活动逐步加强：

在上海，林立果指使王维国秘密组织名为“教导队”，实际上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秘密的“敢死队”，他们整天在新华一村进行捕俘、格斗和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广州，林立果指使广州民航局政委米家农组织“战斗小分队”，多次要密友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且制定了联络暗号、密码和警词、队歌。

林彪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收集情报，训练骨干，策划各种阴谋活动。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组织了情报网，使用窃听器、暗中监视等特务手段，搜集情报，掌握动向。

以北京为基点的秘密通信网也组织起来。为了建立秘密通信网，林彪一伙盗窃了大量通信装备器材，私调了几十对专线。

在北戴河，他们秘密修建了一座直升飞机机场，还私调 and 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从1971年3月到9月初，林彪一伙派出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刘锦平（原民航总局政委）、王维国、陈励耘等十多名死党，先后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和阴谋活动。

林彪一伙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反革命部署。乌云滚滚，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就要开始了。

（三）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主席乘坐的专车从北京开出，跨过黄河、长江，向祖国南部驶去。

8月16日，毛主席到达武汉，停留了10天。他在这里先后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5次谈话。据当时在毛主席身边的同志介绍，毛主席着重谈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毛主席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们“心里有鬼”，“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毛主席还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吾吾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边还有人”，“我不就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毛主席特别交代他的谈话内容，大家都不许传达。

8月27日至9月2日，毛主席在长沙和南昌分别同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长沙的时候，毛主席当着大家的面，直截了当地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

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丁、刘二人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

9月3日，毛主席从南昌到了杭州。一些曾经多次接待过他的工作人员，纷纷前来看望，向他谈了一些情况。据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在杭州同当地的负责人谈话的情况，同在其他地方的情况迥然不同。他特别讨厌那个鬼鬼祟祟的陈励耘。毛主席面对面地查问了陈励耘的经历，并问：“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陈励耘狼狽不堪，答非所问。

杭州的景色依然那般秀丽动人，可毛主席却在这里闯进了“虎穴”！林彪的死党、“三国四方会议”上确定镇守一方的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着“警卫”毛主席住所的工作。

这时，林彪一伙正在千方百计策划毛主席的南巡路线，窃取他在各地的谈话内容，以便为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选择时机。

1971年9月5日深夜，一条电话线在传递着两个死党的通话。北京的于新野正在向广州的顾同舟（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探听毛主席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并随即密报叶群、林立果。顾同舟还把毛主席的谈话整理成一份记录稿，和他的老婆以去北京治病为名，乘飞机到北京，交给“联合舰队”。

9月6日凌晨6时许，武汉东湖宾馆一间豪华的套间里，有两个人在窃窃私语。那是从北京专程陪外宾来武汉的李作鹏，正在听武汉部队政委刘丰密报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完后，急得团团转。当天他一返回北京，就把刘丰密报的内容告知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拿起保密电话机，又将这一情报立即传给了在北戴河的叶群。

林彪、叶群接到黄永胜和顾同舟的密报后，心慌意乱，深夜策划，下决心乘毛主席还在各地巡视的时机，对毛主席下手。这是1971年9月6日，毛主席正在杭州。

接着来的6天是惊心动魄的6天，一天比一天紧张。9月7日，林彪指使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电话机与黄永胜通话，随后，黄又同李作鹏通了话。

9月8日，林彪用红铅笔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写下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照原计划、宇驰同志传达的命办”。与此同时，叶群也密封了一个亲启件给黄永胜。

当晚9时，林立果带着林彪手令和叶群给黄永胜的密件，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星夜飞回北京，并让王飞将密件亲自送交给黄永胜。11时30分，林立果、周宇驰来到北京西郊机场他们的秘密据点，同江腾蛟、李伟信一起死党，策划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谋杀毛主席。林立果在向这些同伙传达林彪手令的时候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经决定在上海动手”，“我们研究了三个办法，一是用火炮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接着，林立果向江腾蛟命令道：“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警卫营攻打钓鱼台。”

周宇驰预言道：“要干就快去。为了保密，坐火车去，到苏州下车，上海来车接你，你的代号是‘歼7’。”江腾蛟当场表示：“坚决干！”

林立果又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指林彪）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

“你如能完成这个任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由你挑选。”周宇驰随声附和着。

“你看我们的三条办法行不行？有没有把握？”林立果问江腾蛟。

“如果都用上了，可能有六、七分把握。”江腾蛟回答。

周宇驰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打仗就是七分把握三分冒险。”

9月8日这一天，黄永胜、吴法宪多次同叶群通过电话密切联系。

9月9日凌晨，林立果从北京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来到空军学院，向“联合舰队”成员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副主任叶世英、秘书程洪珍等说：“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个人顶几个人、十几个人用！”接着他拿出林彪的手令给他们传阅，并说：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

这天下午，林立果等一伙法西斯分子在西郊机场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江腾蛟在会上提出，如果毛主席的火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小油库，趁救火的乱劲“上去干掉”，“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

“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如果有，炸铁路的办法最好。”周宇驰问江腾蛟。

“桥有好几座，但都有陆军看守。”江腾蛟回答着。

接着，他又献策：“要炸铁路，最起码一段比较合适。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边又无其他部队。”

“现在来研究京、沪之间的联络问题吧。”周宇驰说。

江腾蛟提出：“如果日—52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向他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

9月9日这一天，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通过保密电话进行了频繁的直接和间接的“高级接触”。半夜，当叶群与邱会作的老婆通话时，还

发生黄永胜、吴法宪同时争着要同叶群通话的事，大大为难了电话总机的值班同志。黄永胜拿起电话同叶群一谈就是90分钟，吴法宪等得不耐烦，几次催促。

吴法宪同叶群通完电话后，即向死党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下令：“叶主任（指叶群）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飞机一定要好好检查，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启用”。

9月10日，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等人从空军司令部索取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国家电台频率表，北京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和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广州、福州地区机场资料，为他们以后叛国外逃作准备。

同一天，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刘沛丰从北戴河带回北京，由林立果、周宇驰交给王飞，要王飞伺机送给黄永胜。那封信上写道：“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你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所谓“有事时”者，亦即他们搞武装政变发难之时，或危急之际也。

9月10日这天，叶群、黄永胜之间继续通过保密电话密谈，共达5次之多，其中通话最长的一次竟达135分钟。

从9月6日到10日，这短短的5天里，林彪、叶群指挥林立果一伙在“联合舰队”的魔窟里，就是这样密谋策划一场罪恶的武装政变的实施计划。

这5天里，毛主席仍在杭州的住所。9月8日午夜，大家刚吃完晚餐，毛主席突然叫过身边的同志，要他立即把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车趁夜转移。9月10日下午3时许，毛主席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并且交代，不要陈励耘等送行。这一切是那么突如其来，使得陈励耘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3个多小时后，毛主席的专列驶进上海，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停下。这时在北京的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收到了从上海发来的密语情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

“摊牌”的时刻快要到了。林立果一伙按照“常规”推算，估计毛主席总得在上海待几天。但是，他们的估计大错特错了。

9月10日晚，毛主席到上海后，没有下车，就住在专列上。他要身边的同志往南京打电话，通知许世友立即来上海。11日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有人就领着 he 乘汽车直驶毛主席的专列。

由林彪一伙安排在上海动手杀害毛主席的王维国，这时没有被允许上车。他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

中午，毛主席叫许世友同志和其他被找来谈话的人一起下车吃饭，王维国也被一同拉走了。

9月11日下午，毛主席的专车在江原原上奔驰。就在这个时候，北京西郊机场的小平房里，林立果一伙进一步密谋策划杀害毛主席的具体措施。林立果说：“首长”的决心已定，先搞“南线”（指在上海地区谋杀毛主席），接着搞北线。他问关光烈（驻河南某部政委），火箭筒和火炮喷射器的性能如何。江腾蛟嘴说：“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呀”。

林立果以命令的口气对关光烈说：“把你指挥的火炮喷射连调到上海去，听他（指江腾蛟）的指挥。”

“我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把喷火连运到上海，要解决交通工具问题。”关光烈回答。

“用飞机送，就说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林立果说。“如果在上海搞不成，就在（苏州附近的）硕放炸火车。”江腾蛟还提出，这个“任务”交给空军××师，由鲁晔（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去执行。

当晚8时，林立果、江腾蛟、周宇驰、鲁晔继续在西郊机场策划。“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自己——干掉。江政委（指江腾蛟）你这个‘歼7’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成，不就成那个部长（指鲁晔）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尔—10轰炸。”林立果杀气腾腾地说着。

江腾蛟在一旁打气说：“我是歼七，老兽是歼八”。

周宇驰补充说：“硕放桥如有人检查和保卫桥梁，就把他们的人先干掉，把衣服脱下来，换上我们的人。”

话音未落，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密报毛主席“今天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过了上海。”

……

这时已是9月11日晚上10点多钟。毛主席的专车早已驶过苏州车站，安然地跨过硕放铁桥。

“主席，前面是蚌埠，停不停？”毛主席身边的同志问。

“不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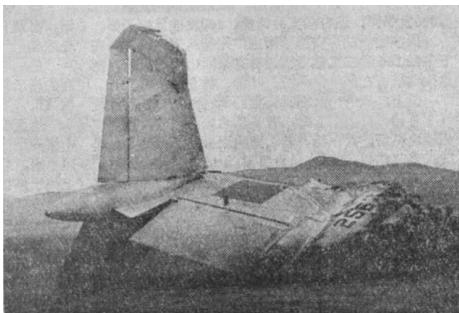
“济南快到了，停不停？”

“不停。”

“快到天津了，停不停？”

“不停。”

（下转第四版）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最后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新华社稿

吴法宪出庭了。他拖着肿胀的身躯，行动艰难的步伐。

他身上背负的罪恶过于沉重了。
11月23日下午3时开始，第二审判庭开始对吴法宪进行审问。这是对他所犯罪行进行法庭调查的开始，也是清理他作为林彪集团主犯的罪恶生涯的开始。

“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

第二审判庭一开庭首先提审吴法宪。吴法宪是林彪手下一级最为俯首帖耳的干将。连吴法宪本人在亲笔供词中也承认：“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

这帮以君臣、父子为信条、忠于一个人作为准则的封建主义加法西斯主义的混血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把持着国家的重要。今天，他们又在人民的法庭上受审。真不知他们脑子里又在想什么？

在江华底长宣布第二审判庭开庭后，伍修权审判长主持了今天的庭审。法庭调查开始后，周焕星审判员单刀直入地讯问被告：“吴法宪，‘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遣、指挥（简称‘两个一切’）’，这个话是不是你讲的？”

吴法宪噙噙地承认“两个一切”是他提出的。这“两个一切”事非小可。长期担任空军高级领导职务的人都知道，作为当时的空军司令员，未经中央军委批准，私自把空军的指挥权和调动权交给林立果，是理应科以重刑的严重犯罪行为。

事实是最鲜的。法庭上展示了书证、物证，并传了证人。空军原政治委员王辉球1980年9月26日书写的证词说，吴法宪当着他的面前两次说过“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梁璞出庭证明，在1970年7月6日的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正式传达了吴法宪的“两个一切”。由吴法宪签署的空军（69）政干任字第94号命令当独在幕布上投影，白纸黑字写着政干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面对这些证据，不得不承认确系事实。

“两个一切”的由来

不到两个半小时的庭审调查，终于揭开了林彪、叶群勾结吴法宪推行“两个一切”的过去不为人知的阴暗的隐秘。

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当时怎么会想到，在林彪之流手持“红小书”、口喊“万寿无疆”的闹剧的幕后，他

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

（上接第三版）

专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一路不停，直驶北京。快到丰台了，毛主席突然下令在丰台停车，并把北京部队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专列最后驶进北京站时，已是9月12日的黄昏。

（四）

毛主席突然回到北京的消息，象一声炸雷，把林彪一伙从武装政变的迷梦中被震醒过来。连续六个昼夜苦心策划的阴谋顿时化为泡影。这帮家伙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林立果痛哭大哭：“我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呀……”在北戴河莲花石96号别墅里，林彪脸色铁青，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不吭一声；叶群如丧考妣的哭声传入窗外服务人员的双耳。

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彻底破产了，大势已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林彪、叶群决定带着黄、李、邱“四大金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以图“东山再起”。

9月12日上午，林立果在北京同北戴河通了电话，接受了林彪安排的南逃新任务。下午，他就把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李伟信等召集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具体策划南逃方案。此时，林立果急于要乘256号三叉戟专机去北戴河同林彪、叶群会面。他一面收拾东西，一面同伙们说：“情况紧张，我立即转移。由周宇驰同你们谈谈。”室内气氛顿时就紧张起来了。

周宇驰压低嗓门向伙们传达了林彪的南逃计划。“情况紧张，（毛主席）要动手了”。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广州，要委办主事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明天到广州谈话……。

“到那里以后，首长召见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朝的局面。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

“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

会议结束后，这伙亡命之徒立即按照这一方案分头行动：

王飞回到空军大院的一间密室，同党羽具体拟定跟随林彪、叶群和黄、吴、李、邱南逃的人员名单，并确定组成几个小组保护黄、吴、李、邱安全登机南逃。密谋还在进行，他们就从仓库取出30支五九式手枪和2、000发子弹，还有两支冲锋枪、200发冲锋枪子弹。

周宇驰同胡萍安排了南逃广州的八架飞机，并在下午乘256号三叉戟专机送林立果回山海关机场，把在飞机上留在那里供林彪、叶群、林立果使用。

晚上，周宇驰又召集死党们开会，宣布：“明天（9月13日）上午8时，首长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黄、吴、李、邱明天上午7点到达8点起飞，直飞广州，江腾蛟负责警卫，保证他们安全到达。”一小撮准备跟随林彪南逃的死党，手忙脚乱地捆装着他们窃取到的党和国家的大量机密文件以及胶卷、录音带和外币。

林立果带着刘沛丰登上林彪的专机。当晚8时许，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林立果等不及北戴河派车来接，便自己开着机场的一辆吉普车，直奔北戴河林彪住地。

莲花石96号别墅，表面上似乎一切依旧，大厅里还在放映电影，但是在紧闭的窗间，气氛却异常紧张：那是林彪和叶群在低声密谈些什么，后来又加进了林立果；那是叶群在收拾文件，整理卡片，刘沛

初审吴法宪

——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侧记之一

本报记者 胡思升

们正在为建立世代相传的林家王朝投下一步步的棋。

“两个一切”是重要的一着棋。它原来是这样投下并布局的。

1969年10月2日，林彪在毛家湾住地召见吴法宪。密室之内，林彪透露了真情：

林彪：“林立果在你空军工作不嘛嘛！”
吴法宪：“很好。林立果在空军我们可以经常听到你的指示。”

林彪：“我脑子里经常想空军的问题，特别是空军的训练作战问题。我依靠林立果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我的意见要立果兼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你要放心。我的儿子在空军是为了扶持你这个司令员，不会挖你的墙脚的。”

很显然，林彪把林立果放空军，当然不是去挖吴法宪的“墙脚”，而是别有图。吴法宪对此是心领神会的。

何以见得？把年代再往回推两年，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林彪的“眼珠子”

1967年3月，林立果年方23岁，林彪就把他交给吴法宪，安排进空军。这个不是党员的林彪之子，立即被任命为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过了几个月，吴法宪和周宇驰（林彪集团另一名主犯、空军原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就充任介绍人把林立果拉入党内。

林立果一向被林彪称做是他的“眼珠子”，林彪把“眼珠子”放到最富于机动性的空军，是别有一番考虑的。1969年2月16日，林彪亲笔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提出要让“老虎（林立果小名）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

而在上述林彪、吴法宪10月密谈之后，这个没有当过兵、没有经过基层工作锻炼、没有空军实践的林立果，就被提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这一从战士到师级干部的火箭式晋升，全过程仅仅两年。为此，叶群亲自打电话给吴法宪，勉励有加，并情不自禁地说：“立果升官了呀！”吴法宪马上须臾拍

马，说：“是。是你做母亲的教导有方啊。”

交托了“两个一切”的权力，吴法宪犹犹未尽，还要大树特树林彪果的“天才”形象。

1970年6月下旬的一天，吴法宪叫他的老婆兼“吴办”主任陈绥珍打电话叫王辉球单独一个人去西山住地。吴法宪这个空军的第一把手，要同空军的政委商议什么空军大事呢？谁能料到，吴法宪不惜贬低自己这个参加过长征的五级干部，大加吹捧到空军入伍才两年多的23级干部，说：“林立果不简单，……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我这个司令你还不知道吗？不行！要靠林立果。林立果又有那样的天才，将来要靠他。我们要听林立果的。”

超“天才”的表演

从此，一个围绕着林立果的奇特的捧“天才”的运动，宣告开场。

1970年7月6日的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吴法宪的老婆陈绥珍首先制造舆论，“应该向立果同志学习，立果同志在林副主席、叶主任（即叶群）身边，领会林副主席指示深，主要是立果同志天才，从各方面来讲是我们的老师。”

在这之后，阿谀奉承林立果之词日盛。诸如“立果同志的指示要及时传达、照办，坚决照办”，“对立果同志的态度和对毛主席的态度是一致的”。奇谈怪论，层出不穷。被林彪亲信把持的空军政治部党委竟然通过决议，宣称为了贯彻“两个一切”，必须“时时想到”，“事事请教”，“处处保卫”林立果，什么“老老实实在地服从他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的指挥”，林立果“要求什么，就做什么”，等等。

1970年7月31日，超“天才”的主角出场了。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所谓“讲用报告”。这一天，吴法宪和陈绥珍都在西山住地，当“讲用”即将开始时，他们尚未起床。吴法宪一听说此事，马上叫陈绥珍亲临“讲用”会场。林立果讲时整整一天，废话、空话、假话连篇，甚至胡诌什么对精神病患者和疯子，只要一念毛主席语录，病人就“热泪盈

11点40分，在别墅里值勤的警卫战士用电话向警卫大队队部报告：

“现在，他（指林彪）出了房门，向防空洞走去。”

“现在，他在防空洞上了红旗车。”

“现在，汽车开出去了。”

警卫部队干部们，一齐从大队部跑了出来。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辆高级防弹红旗轿车，打开前灯，高速行驶。里面除林彪外，还坐着叶群、林开前等。汽车驶近大队部门口，警卫战士示意要车停下。叶群在车上大喊：“警卫部队对林副主席不忠，冲！”车子急速地闯了过去。警卫部队的负责人随即分别坐上轿车、吉普车尾随追去。

林彪一伙乘坐的轿车，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穿过海边大桥，很快就越超过了在几分钟前奉命去机场阻拦飞机起飞的三叉戟飞机部队，往山海关机场逃窜。车子一直开到三叉戟飞机前，未等停稳，林彪一伙就仓惶跳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他们不等架上客机梯子，就顺着驾驶舱的小梯，一个紧跟着一个往上爬。林彪的脑袋几乎顶着了叶群的高跟鞋。他们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登上飞机，也没等关上机舱门，就要飞机急速启动，强行滑出。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撞碎了机翼上的玻璃灯罩和有玻璃窗。在机舱口盖关闭了夜航灯和没有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在一片漆黑中于9月13日0点32分强行起飞，仓惶逃命。

13日零点20分，当林彪的专机准备强行起飞时，机场负责人三次打电话向李作鹏报告：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竟不下令采取阻止起飞的紧急措施。

“林彪坐飞机跑了！”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向北京报告。那是13日零点32分。

“林彪的飞机向北飞去！”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报告总理。

周总理发出命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的雷达，密切跟踪着林彪的飞机。随时向总理报告飞机的方位和飞行角度。

“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总理问。

“能听到。”调度人员回答。

“我要对潘景寅（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总理说。

“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他不回答。”调度人员报告总理。

飞机来了一个狡猾的动作，改变方向，往西飞往内蒙古西部。但到了西部上空，突然往北直飞。

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荧光屏上消失了。”调度人员报告。这是9月13日凌晨1时50分。

林彪叛国投敌了！周总理把电话机一摔，立即驱车前往中海南苑毛主席住所接见。毛主席气愤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凌晨3时15分，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向总理报告：“雷达情况，发现一架直升飞机起飞了！”这一突然发生的新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周宇驰接到林立果出逃命令，就通知江腾蛟、王飞、鲁珉等一伙赶紧撕毁南逃人员名单和会议记录。他自己伙同于新

晖，霍然痊愈，等等。可是，这种现代符咒术竟被说成是“充满毛泽东思想，充满唯物辩证法”，给空军“指明了方向”，而陈绥珍在林彪“讲用”结束后，更带头振臂高呼“向立果同志学习”，不下几次，丑态百出。

吴法宪也亲自出马，吹嘘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陈陆耘等则大讲林彪是“立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竟印行70多万册，广为散发。

法庭调查所集中展现的这一切，令人愤慨。一位旁听者对记者说：吴法宪的所作所为，可以用6个字概括，可恶、可笑、可耻！

为武装政变开道

“两个一切”和“天才论”的噱头，这不只是一种丑恶的政治现象，更是为林彪、叶群密谋杀害毛主席、策划武装政变大开方便之门。

有了“两个一切”，杀气腾腾的以林立果为头子的“联合舰队”便很快拼凑而成，并四出活动。

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周宇驰才得以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空军内部设立十四个反革命秘密活动的据点。

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伙同空军内部的周宇驰等人就草拟出《“571”工程纪要》，准备“实行暴力突变”，以“夺取全国政权”。

有了“两个一切”，林彪、叶群才能密令林立果动用空军的兵器、火器，从轰炸机到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图谋杀害毛主席。

有了“两个一切”，林彪、叶群才能指使林立果私调三叉戟飞机，妄图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并在最后仓惶北飞叛国。

林彪所谓“脑子里经常想空军的问题”，就是利用空军这一最机动的兵种来念他自己的“政变经”。吴法宪抛出“两个一切”，就把林彪“脑子里”的蓝图变为真刀真枪的实际。

下午4时47分，法庭调查结束。伍修权审判长宣告：对被告吴法宪追随林彪、叶群，给予林立果以“两个一切”的特权的罪行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充分的。

吴法宪在今天的法庭上，对他干下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记者对特别法庭获悉，对吴法宪所犯的其他罪行，法庭将继续进行调查，并按照犯罪事实和认罪态度进行判决。

野、李伟信以执行紧急任务为借口，窜到北京沙河机场劫持了一架“直—5”直升飞机，携带林彪一伙盗窃的大量机密文件和美钞向北飞去。周宇驰用枪对付着驾驶员陈修文，强迫他直飞乌兰巴托。陈修文发现他们要叛国出逃时，沉着机敏地骗过了敌人，把飞机又飞回到北京郊区的上空，最后在怀柔县境内降落。陈修文同志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周宇驰感到末日来临，开枪杀害了陈修文。

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的当地军民，从四面八方围过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爬出机舱，不辨东西地狼狈逃窜。解放军驻京部队和民兵、社员，把他们逼进了一块庄稼地里。周宇驰绝望地说：“看样子走不了了，今天我们就要死在这里了。”他对两个魂不附体的同伙说：“有两个死法，你们怕的话，我先把你们打死，我再自己死；你们不怕的话，我们都自己死。”后来三人商定由周宇驰喊口令，一起开枪自杀。于是这3个反革命分子就地躺倒，只听周宇驰有气无力地喊着：“一、二、三！”砰，砰，两声枪响，周宇驰、于新野自毙；李伟信向空中放了一颗，最后被当地军民捕获。

东方开始微露晨曦，大会堂东大厅内的灯光似乎也显出倦意。可是，周总理却还在不知疲倦地操劳着。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了。值班的服务员和秘书劝总理暂时休息一会儿，总理严肃地说：“现在怎么能休息呢？”

十三日这一天，从一早开始，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周总理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一一打了电话，向家打招呼，布置任务；并随时把情况报告给毛主席。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周总理已经连续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这时已是9月14日的中午。总理躺了下来，好久才入睡。下午2时，电话铃声又响了。“我是外交部，我们刚接到驻蒙古大使馆的一份电报，要立刻送给总理。”当外交部把电报送来时，秘书踌躇了：“好不容易让总理休息下来，他怎么忍心把他叫醒。叫醒吧，又可能耽误大事。”他在忍心卧室前徘徊着，最后还是轻轻地走到总理床边，叫醒了总理。总理听说我是驻蒙古使馆发来了电报，连忙起来，叫秘书赶快念给他听。当总理听到驻蒙古所乘的256号三叉戟飞机13日凌晨2点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得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总理接过电报，就向毛主席报告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

我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人员赶到林彪飞机坠毁的现场观察，只见飞机摔得粉碎，遍地残骸，机翼狠狠地留下一道几米长的沟痕，一只飞机轮胎飞出数百米远。飞机残骸的四周，一大片野草被烧焦。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的尸体，被抛在离飞机残骸十多米处，横七竖八地倒在茫茫荒野上。叶群的一只高跟鞋，以及林彪一伙携带的六五式九式手枪、一支冲锋枪，也都在飞机残骸附近。

林彪、叶群摔死后，黄、吴、李、邱群惶然如坐针毡，翻箱倒柜，销毁了他们同林彪、叶群等的来往信件、笔记本、电话记录、照片等罪证。黄永胜因毁灭材料数量很大，竟把一个大同瓷缸摔碎。他们既不敢揭发林彪、叶群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中央鉴于他们毫无悔改之意，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要他们交代问题。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阻挠，他们的罪行长时期没有得到清算。今天，他们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新华社记者 刘回年 赵琦 徐心华

周慧朴 杨金洲

